

牢记『老厂长』嘱托，光大『光明』品牌

光明食品集团干部职工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

光明食品集团的光明火炬品牌商标，是由江泽民同志在1950年亲自创立的，寓意“解放了，天亮了，光明照亮中国”，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。

当江泽民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，光明食品集团上下十分悲痛，满怀敬意和深情悼念江泽民同志，自发以各种朴素的方式寄托绵远的思念。

“江泽民同志曾在我厂任第一副厂长，负责研制和创立了‘光明牌’食品，带领老一辈益民人做大做强民族品牌。”光明乳业旗下益民一厂党支部书记、总经理张楠告诉记者，江泽民同志生前多次关心关怀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的改革发展进程，走访厂区和员工，全体益民人对他怀着无限的敬重和敬仰之情，“我们将牢记江泽民同志的谆谆教诲与殷切希望，立志把光明品牌发扬光大。”

“我曾有幸见过老厂长，虽然接触的时间短暂，但深深感受到他对光明牌以及中国食品工业的关怀。”曾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总经理的何国樑回忆当年的场景。2010年，江泽民同志时隔多年，来到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历史展示馆。按照安排，何国樑陪同江泽民同志参观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在之后的小型汇报会上，江泽民同志当场点名要何国樑列席。

“老厂长说了，要我这个总经理进去汇报。”当时，江泽民同志坐在办公桌旁，十几名领导围坐成一圈，轮流发言。当听到何国樑介绍赤豆棒冰、绿豆棒冰、盐水棒冰这三大防暑降温产品时，他讲话了，主要表达了两点：一是产品要保质保量，二是保证高温下的供应。

“老厂长特地关心了高温下棒冰这一民生产品的供应。我感觉到，他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，同时也希望盈利不是单靠调价来实现。”何国樑回忆说。

曾任益民食品一厂党委书记、副总经理的侯少雄，听闻江泽民同志逝世的消息，难掩悲痛之情。他清楚地记得，2006年参加接待江泽民同志的情景。当时，80周岁的江泽民同志精神朗朗，谈笑风生，风趣幽默，充满自信，在场的人深受感染，“我们感受到他严谨认真而又富有激情的个人魅力”。

侯少雄回忆，当天江泽民同志关心地询问冷饮生产的发展情况、工人上下班的车辆问题，并凭借惊人记忆力时不时用英语讲述当时的设备名称、规格。

“在整个参观过程中，他没有说官话套话，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。在他身边，完全没有紧张感。”有一句话，侯少雄至今印象深刻：“老厂长说，我后来虽然离开这里，到中央去工作了，但还是蛮关心这家企业的发展。”也是在这个汇报会上，江泽民同志将益民食品一厂称为“中国食品工业的摇篮”。

情系光明的背后，其实还有江泽民同志对中国整个食品工业的关心。他认为食品已经不单纯是和农业有关的粮食问题，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，应该发展为在国计民生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庞大食物工业系统。

在江泽民同志的殷切嘱托下，“光明”从最初的一个冷饮商标发展成为

上海食品工业的象征。由上海益民食品一厂(集团)公司等共同组建的光明食品(集团)有限公司，已横跨乳业、饮料、食糖等食品业各个子行业，涉及食品研发、生产、加工等产业链上下游环节，并积极探索食品产业与城市综合服务融合共生的组织形态变革，努力构建光明城市服务新模式和新体系。

光明食品集团表示，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化悲痛为力量，继承江泽民同志的遗志，团结奋斗、真抓实干，大力弘扬“光明文化”和“光明精神”，让“光明”的火炬永放光芒。

束涵

他的言行风范令我深受教益

叶公琦

江泽民同志1985年到上海工作的时候，我是分管财贸和农村工作的副市长，有幸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。他的言行风范令我深受教益。我感觉他的个性特点是：感情丰富，为人随和，爱憎分明，表里一致。

他到上海不久就问我：“上海的财力如何？”我说：“就是吃饭财政，连修马路的钱都没有。”知道了上海的家底后，他又问我：“上海的老百姓最希望解决什么问题？”我回答他：“上海的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菜篮子，就是每天都要吃的副食品。”

江泽民同志不久就提出了“菜篮子工程”。他说：“我是一名工程师，菜篮子要作为系统工程来抓。”他提出菜篮子工程要加强市场机制，不仅生产这头要放开，销售这头也要放开。那几年，我们就是按照“两头放开”的工作思路，用市场机制来调节，一步一步地走，解决好“菜篮子工程”。

当时的财政比较困难，为解决“菜篮子工程”经费问题，我们建立了一个基金，由企业按职工人数每人出几元钱，汇集成一笔副食品发展基金，解决了经费问题，也就是“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”。

作为系统工程，“菜篮子工程”的子系统一一推开。首先抓种群，

那时上海副食品短缺严重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种群退化，比如一头奶牛的产奶量只有人家的一半。怎么解决，我们就大量引进奶牛、猪、鸡等的优良品种。

其次是加大规模。当时的养殖规模太小，我们就学习先进经验，改进设备，一个人可以养2000只鸡，一年可以养五到六批，实现规模化生产。

第三就是加强科研工作，比如冬季矮脚青菜、青浦茭白就是上海农科院培养出来的好品种。推行地膜、小棚、大棚的种菜方式，提高蔬菜的成长率。

我们还建立了一批规模化生产的豆制品工厂，每到冬季、夏季蔬菜紧缺的时候，就供应豆制品、黄豆芽、绿豆芽。

当时副食品运输、保存困难，我们就提升仓储、运输水平。此外我们也借助外援，江泽民同志曾经亲笔写信给江苏、河南的领导，我就拿着他的亲笔信去这些省份商购猪肉等副食品。

江泽民同志来上海的时候，肉、油、菜、蛋等副食品都是凭票证购买的，在他离开上海到中央工作的时候，这些副食品票证都不用了，副食品放开供应。同时上海的财力也有了很大的增长，为丰富市场更打下了基础。这充分证明他抓群众最关

心的问题取得了实效。

另外一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，江泽民同志始终像老朋友一样关心其他同志。1986年，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朱宗葆同志突发心肌梗塞成为植物人。江泽民同志经常去医院看望。每次去，他总是反复叮嘱医务人员：“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照料好他。”

江泽民同志离开上海的时候特地关照我：“宗葆同志的家属你要多关心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。”他担任了总书记后，在宗葆同志逝世后还专门请宗葆同志的夫人到他家做客，让夫人王治坪同志陪她参观了中南海。宗葆同志夫人经常说：“宗葆出事的时候，我真的快支撑不了了，没有江泽民同志的一直关心，我活不到现在。”

尽管江泽民同志是领导，但性格随和，没有架子。他有很多爱好，会弹钢琴、拉二胡、吹笛子、唱京剧等。他从总书记岗位退下来之后，有一次在上海和我们联欢，朱镕基同志拉胡琴，他唱京剧《打渔杀家》，那其乐融融的场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。

江泽民同志经常引用文天祥《过零丁洋》里的两句诗：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？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他一生也是这样实践的。

在他领导下干得虽累但很舒心

谢丽娟

江泽民同志1985年来沪任市长，我刚自卢湾区政府副区长经市人大选举任副市长。因我在区政府任职才一年多，因此对来自中央的江市长持有敬和远的感觉。

在第一次市长办公会上，我被明确分管教育、卫生、民政和民宗等方面工作。会议最后，江市长说，今后按照各自分工开展工作，凡有重要事项则报送市委后定。我顿时既感到责任之重，更感到江市长的信任，自己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，敢于工作。

江市长在办公会上商研事项中，善于发扬民主听取不同意见。有一次我提出了与他截然相反的意见，没被采纳。但江市长没对我不满和指责。由于他的民主与宽容，使大家都能坦诚表达各自的见解。

难以忘怀的是1988年上海甲肝暴发。本市的病床共计5.5万张，难

以收治数以几十万计的病人，发生了病人及家属拥挤病床的恐慌，以致需要警察进医院维持秩序。上海甲肝疫情严重，当时在京参加人大政协“两会”的同志在食宿方面都因此受到与众不同的“待遇”。江市长虽在北京开会，但始终关心着上海的疫情，多次通过电话听我汇报，并问我还有哪些对策建议。他同意召开全市委办局区长会议，江市长在会上要求全市动员起来打一场扫除甲肝的人民战争。

此后为解决肝炎病人尽可能收治的问题，企业利用库房解决企业内的甲肝病人治疗问题；街道组织一些旅馆停止营业，改为简易病房；房地产部门把一些新建的住房暂不商住，改为临时病房；教育部门让部分学校改为临时病房。还有部分轻症病人在家中隔离治疗。市卫生防疫部门加强了宣传和消毒工作。

经过两个多月的甲肝防治，甲肝发病人数由每天一万数千逐渐下降接近正常发病率。那次上海甲肝病人总计逾30万人，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很大。后来社会上有声音说要追究甲肝暴发的原因和责任人，具体就针对市卫生局局长和分管卫生的副市长。对此，江市长亲自去市政协解释疑问，对我的抗疫工作予以肯定，并说：“我是市长，要说领导责任那就是我的责任。”在这年年底评出的年度工作优良的局长名单中，市卫生局长王道民局长是其中一员。

江泽民市长是一位对下级有鼓励、能保护的领导，他善于调动人的积极性。在他的领导下，大家都敢于大胆工作，不畏首畏尾。

江市长的民主作风、宽容待人，鼎力支持下级的气度，使我们工作干得虽累但很感舒心。

(上接第12版)

“江泽民同志对母校的众多寄语中，带给我们最大信心和力量的就是‘继往开来，勇攀高峰，把交通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’。”上海交大原党委书记王宗光表示，“最珍贵的，是江泽民同志给中国高等教育工作者树立了一个远大志向，那就是中国高等教育要从世界舞台的

边缘走进舞台中央，并且一定可以实现！”

虹口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傅胜，曾在上世纪50年代与江泽民同志同为当时的北四川路区第一届人大代表。昨天上午，电视机前的他再度回忆当年，感慨万千，“江泽民同志是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，带领我

们国家战胜了各种困难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顶住压力，以战略定力稳住大局，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。”他说，“现在，我们要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，化悲痛为力量，团结起来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。”